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四十八辑（总第一四八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八辑（总第一四八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48 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11

ISBN 7-5034-1291-7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635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华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125 字数: 210 千字

印 数: 35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任 朱作霖

副主任 刘 恕 刘济民 李东海 吴 福 宋 堃

金开诚 金冲及 龚育之 张文惠（常务）

委 员 王庆成 王晓秋 王楚光 刘景录 李汉秋

陈 威 陈 砾 陈漱渝 周秉德 弥松颐

傅璇琮 舒 乙 党德信 马 威 胡太春

俞兴茂 霍明光

本辑执行编委 张文惠 俞兴茂

本辑执行编辑 孙晓鸥

目 录

军政史料

忆国民军训	李骧骐 (1)
国民党军需署亲历记	黄念勤 (17)
庐山高级政工会议纪实	秦 箴 (24)
湖北襄枣师管区军服舞弊案始末	李春初 (34)
陆军大学的教育情况	章 培 (43)
陆军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回忆	卢凤阁 (61)
国民党各派系在西南公路上的权利争夺 ...	苏从周 (78)

人物述林

“山东王”韩复榘琐记	王华岑 (84)
我所了解的刘茂恩	刘亚仙 (98)
我所知道的刘郁芬	范学增 (112)
刘震东生平	刘 林 刘淑华 (130)

宗教史料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忆略	王佐良 (138)
解放前天主教在阆中概况	阆中县政协 (142)
建国前河套区天主教史略	段德荣 (147)
北京道士火烧白云观安世霖、白全一亲	

历记	许英华 (155)
我所知道的虚云和尚	觉 澄 (167)
能海法师集传	仁 祥 (183)
我对太虚大师生平的回忆	雪 嵩 (191)
杨仁山居士的生平及其事业	游于默 李 安 (194)
忆格达活佛	邓珠拉姆等 (205)

文化史料

艺涯南北七十年	徐志良 (212)
---------------	-----------

忆国民军训

李 驥 骐*

我在 1935 年到 1937 年间曾经主办过上海市的国民军训（包括公民训练），又在 1939 年到 1943 年主办过全国性的国民军训。现将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写出来，提供编写文史资料的同志参考。但仅凭记忆，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对这方面情形熟悉的同志加以指正补充。

国民军训的实质及其演变

国民军训最初是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对全国青壮年普遍实行军事控制和政治麻醉的一种形式。早在复兴社未成立前即 1929 年，蒋介石就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套办法，开始试办青年夏令营，在暑期内实行短期的军事训练。后来，凡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普遍实施军事管理和军事训练，并颁布有中等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实施方法，成为中等以上学校教育中一种制度。1932 年复兴社成立后，国民军训就完全成了进行法西斯组织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主持这种组织训练的总机构是在训练总监部内设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名义上为公开的机关，实际上是受复兴社的指

* 作者曾历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军训部国民兵教育处副处长、上海市军训会主任委员、上海公民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

挥。关于这一部门的用人行政，即当时的总监唐生智也不能过问。处长人选最初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后由复兴社举荐。先派贺衷寒为处长，贺因事触怒蒋，派赴日本留学，改由潘佑强继任。潘亦因不得蒋欢，又改派鄧悌继任。蒋介石为进一步毒化青年，以考察名义派鄧悌赴法、意留学，又改派杜心如继任处长。贺、潘、鄧3人担任处长都为时很短，独杜1人从1936年起到1938年训练总监部撤销止，担任处长两年多。贺衷寒、潘佑强、杜心如、鄧悌都为复兴社组织领导层中的湖南人，除鄧悌性情乖僻自负而外，其他几人都是连成一气。还有邓文仪、萧赞育、刘咏尧、张镇、袁守谦等，也都是湖南人，再加上留俄和留日的关系，就形成了以贺衷寒为首的湖南派的小集团。我在1928年到1930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和贺衷寒、萧赞育、潘佑强、杜心如等又恢复了黄埔同学的关系，直到1931年和贺衷寒一同结伴回国，私人情感很好。回国后，因贺衷寒的关系，又和刘咏尧、邓文仪等经常接触，无形中我也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中的一个。我记得有次在南京铜铜巷贺衷寒家里闲谈，贺很郑重地说过：我们的行动须要注意，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和攻击，说我们搞小团体。国民军事教育处始终掌握在几个湖南人的手里，就是这个小团体发生的作用。

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后，于1938年1月17日改组，军事委员会，包括训练总监部在内的有6个部撤销，另成立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至同年初夏组建完成，以第二厅接管国训业务，厅长由原国民军事教育处长杜心如担任，我任副厅长。当时蒋介石虽然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口号下不敢公开反对共产党，但对全国青壮年的思想行动仍然加以严格的控制。陈诚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继续加强对青壮年进行思想麻醉和政治欺骗，首先是加强对原有军训教官的思想教育，其次是培养新的军训干部。蒋介石由武汉撤退到重庆时，在浮图关成立中央训练团，对所有党政军人员进行短期的精神训练。中训团

下设军训人员训练班，调训全国各大、中学的军事教官。又在重庆附近的杜市成立军训教官训练班，培植新的军训教官。对杜心如和我，在业务上也进行了分工，以杜心如兼军训教官训练班主任，长期驻班主持教育，我主持厅务。在中训团调训的军训教官，更分期分批举行，每期训练时间为6个星期。训练内容，除中训团原有的政治课程外，着重业务研讨和思想考察。在杜市的军训教官训练班是长期设置的，训练时间为1年。训练内容是军事和政治配合进行，但着重在政治思想的灌输。由于军训教官散布在全国各大、中学校控制着广大青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资本，陈诚的这项措施，是企图在国民军训部门中造成一个新的系统。

1939年秋，国民政府鉴于兵源补充困难，修改了兵役法，以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实行全国皆兵的口号来号召全国青壮年应征兵役，实际上寓将于学不过是为有钱人的子弟不服兵役开一条出路。由于新兵役法的规定，国民军训的名称已不复存在，原国民军训的社会军事训练定名为壮丁训练；原国民军训的学校军事训练，在中等学校定名为预备军士训练，在专科和大学定名为预备役候补军官佐训练，仍总称为学生军训。由于兵役制度的建立，国民军训已不能为政治部陈诚所独占，首先引起争执的为何应钦主持的军政部，理由是壮丁训练和学生军训都属于兵役范围，军政部主管兵役，这两种训练都应由军政部统一办理。其次是白崇禧主持的军训部也相继起而争执，理由是国民军训一贯为前训练总监部主管，军训部接前训练总监部全部业务，不应该把国民军训这一部门单独地分割出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专门召集有关各部进行多次协商，都不得要领。1940年春，陈诚去职，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长，他把国民军训全部推让出来，这一场争夺战才初步得到解决。解决办法是划分两部掌管，在军政部成立国民兵司，掌管壮丁训练的组织征调一切事宜；在军训部成立国民兵教育处，掌管预备役军士或候补军官佐组织训练一切事宜（仍简称为学生

军训)。关于壮丁训练的人事经费属于军政部，关于学生军训的人事经费属于军训部。这两种训练的教育计划由军训部统一制订。以政治部第二厅长杜心如调充军训部国民兵教育处长，我由副厅长调充副处长。军训部接管学生军训后，同样的首先是调训全国各大、中学生的军训教官，并在中训团第 19 期一次调训完毕。训练内容全照中训团规定。主持教育部的陈立夫一贯对学生军训不满意，过去在复兴社控制之下，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所谓党方（代表 CC 系）、军方（代表复兴社）就互相摩擦，互相争夺。陈诚接管后，上下摩擦并没有停止。到白崇禧接管后，陈立夫即正式提出学生军训应归教育部掌管，理由是学生教育应以科学文化为主，军事教育为辅，为了配合适当，不影响学生的学业，应该由教育部掌管，统一事权。这次的争执比在政治部陈诚主管时闹得更凶，时间闹得更长。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教育部和军训部都开过多次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均无结果。最后，陈立夫控诉于蒋介石，蒋介石令白崇禧与陈立夫两人当面协商。白崇禧不得已约请陈立夫在重庆李子坝住宅直接谈判，还有我和教育部郝更生座。我和白崇禧、陈立夫两人的关系本无所谓厚薄，但因过去我在上海搞国民军训时，和 CC 系的潘公展、吴开先、吴醒亚等的摩擦旧痕尤深，因此并不愿意把学生军训让给教育部。在谈判中，白崇禧和陈立夫都是倾听我和郝更生二人的意见。我是坚持对学生的一般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能混为一谈。教育部主管的是一般教育，军训主管的是军事教育，以学生的军事训练划归军训部掌管是理所当然。当前的任务是要以军事力量把日本侵略军打出中国去，而不是凭空喊。如果国家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学生？彼此谈判至深夜，最后白崇禧支持我的意见，使陈立夫、郝更生不欢而去。通过这次谈判，军训、教育两部摩擦日深。我于 1943 年秋调充军训部第七督训处长，派驻广东第七战区，以后学生军训的争执情况就不清楚了。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军事制度完全美式化，原军事委员会撤销，国防部成立，学生军训划归预备

干部局，这个工具又为蒋经国所掌握了。

国民军训的组织训练

国民军训的组织系统主要分中央、省市及市县三级。中央于1938年前为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主管。1938年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主管。从1940年到抗日战争结束，又改由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民兵司）和军训部（国民兵教育处）分管。省市于1939年前由中央派员会同省市政府及教育、社会有关厅局组织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持其事。1939年后，随中央主管部门的变更和兵役机构的建立，改由省市军管区司令部（军训处）主管。市县于1939年前在市县政府下设自卫团（总队），县长兼团（总队）长，由中央分配社训教官任副团（总队）长，负实际责任。团（总队）以下分设壮丁训练队、常备队、自卫队、模范壮丁队等，按实际情况而定。1939年后，改为市县国民兵团，内容无大变更。在各特别市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即由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直接主办，按市属行政区域划分分别组织若干大（中）队，由各区警察分局长兼任大（中）队长，另派社训教官任副大（中）队长，负实际责任。学生军训，无论学校设置在省市或市县，一律由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军训处）直接指挥，都不通过学校所在地的行政机构，对教育部门仅给以必要的通知。在中等以上学校设军事训练中队或大队，以校长兼任队长，军训主任教官任副队长，负实际责任。其余军训教官或助教分任队干部。

军训教官的来源，主要是从康泽主持的星子特别训练班和梁干乔主持的南京政治训练班调派的。这些班的学员原来都是黄埔各期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复兴社，法西斯作风尤为强烈。在全国范围内，凡中等以上学校多半都派有军训教官和助教二三人到四五人，以各校学生人数多寡而定。各校均设有军训教官办

公室，设主任军事教官 1 人，为中、少校级；军训教官若干人，为少校级；助教若干人，为上尉级。军训教官的升迁调补与奖惩，完全由军训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统一掌握。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可以提出意见，申请办理。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的经常费和事业费，由省市政府开支；所有军训教官的薪金则由国民军事教育处统一发给。其中有少数助教由学校聘任，其应得待遇由学校负责。复兴社在各学校都成立了支社或小组，以军训教官为核心，指导学生进行政治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1. 研究执行复兴社的指示；2. 考察学生的思想行动；3. 同学校中的 CC 系争夺青年；4. 收集情报，向复兴社反映情况。军训教官是受双重指挥，在工作上要接受当地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的调配，在组织上要接受复兴社的指挥。

关于国民军训的实施方案、办法、规则等等规定得很多，其主要内容分为学校军事训练（简称学生军训）和社会军事训练（即壮丁训练）两个部门。在 1935 年前，学生军训逐渐推广到全国各中等学校以及专科、大学。从 1935 年开始由南京市举办壮丁训练，逐渐推行到全国各省县。上海市由于环境特殊，改用公民训练，实质上是一致的。壮丁训练，一般都规定在早晚实施，每天训练时间共为两小时，有军事操练，也有政治讲话。每期训练时间为 3 个月，训练完毕发给受训期满证书，并按地区编组，随时召集复习。在农村的壮丁训练，有的按一般规定分散训练，有的按季节分期集中在县训练。

学生军训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在校训练，即平时训练；一是在营训练，即集中训练。凡中等以上专科、大学一年级新生，必须经过这两种训练，发给受训期满证书，始准升学。在校训练时间，每周六到八小时，完成新兵教育。在校训练时，各学校都组织军事训练队，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在营训练，是在每年暑期举行。由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同当地政府机关组织暑期学生集中训练总队，以省市市长或当地驻军的师长兼任总队长，以国

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为副总队长负实际责任，集中各学校应届毕业或升学的学生统一实施。军训教官都调充中队以下队职干部。中队以上队职干部，则由部队中的营、团长临时调任。在校训练的军事课程，由单人教练到班排教练。政治课程，无论在校在营训练，都始终贯彻着法西斯教育，如“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等，都是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观点出发，用以麻醉青年思想，使之拥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每届集中训练完毕，必大量吸收中毒较深的青年加入复兴社组织，在军事教官的控制下，拉拢落后学生，打击进步学生，搜集情报，阻碍和破坏革命运动。

上海市国民军训的实施概况

上海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简称上海市军训会），由中央派主任委员1人，专任委员3人，上海市教育局、社会局、公安局、保安总团、保卫委员会各派兼任委员1人，共9人组成之。直隶于南京训练总监部，受上海市长的监督指导，并在军事上接受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指挥。会以下设三组，分管学生军训、社会军训及总务文书等工作。主任委员及专任委员的薪金由中央发给，兼任委员只支交通费，由上海市政府开支。首任主任委员为贺崇悌，黄埔一期学生，因受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排挤，到差未久即去职。继任者为焦绩华^①，留德学生，因与CC系有关系，复兴社不信任，又改派我继任，同时并另派专任委员陶一珊、罗克笃、赵柱中3人，彻底改组军训会。上海市复兴社组织的主要骨干为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保安总团长吉章简，大学教授刘炳藜和我，由蔡劲军任书记，吉章简、刘炳藜和我任监察，并另由南京复兴社总社派郑全山为助理书记，负实际责任。

^① 查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军政职官人物志》，记为张绩华。

主要目的为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对文教界、工商界、社会团体都进行组织宣传、情报等活动。军训会的工作，是配合复兴社进行公开的活动。最初只主办学生军训，比较单纯，和 CC 分子的摩擦只限于学校以内。在 1936 年，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市政府下成立上海市公民训练处，组织训练全市市民，以社会局长吴醒亚兼任处长，同上海市军训会形成了对立。吴醒亚是 CC 系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在组织活动上和上海复兴社结成了一对冤家。因此，上海复兴社以公民训练即壮丁训练为国民军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为理由，向市长吴铁城提出异议，反对吴醒亚担任处长。吴铁城对 CC 系和复兴社是两面应付，都不得罪，由于没有理由支持吴醒亚，不得不改任我以军训会主任委员兼任公民训练处长。从此军训会的工作逐渐接触到工商界、文教界、社会团体以及工厂工人和一般市民，不但工作本身错综复杂，并且同 CC 系分子的摩擦更加激烈。针对这种情况，会内三个专任委员也进行了分工，以陶一珊主管公民训练，罗克笃主管学生军训，赵柱中主管国民军事教育，各兼任委员除公安局和保安总团所派者外，只在每月例会出席会议，实际上不过利用他们保持对各机关的联系而已。军训会和复兴社的秘密关系他们是无法知闻的。

上海市设立学校之多，占当时全国之冠，学生人数以数十万计。每年应参加军训的一年级新生约近万人。派驻各中等学校、专科和大学的军训教官、助教约 150 多人。在校训练时，各军训教官每周除担任六至八小时的军事学科或术科的讲授外并对学生生活进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在生活管理中，配合复兴社布置的工作，对学生进行组织宣传和情报等活动。政治教育一课主要由我担任，每星期抽出一两天时间，以视察为名，轮番到各校对受军训的学生作“精神讲话”。利用参加各学校的开学校庆、结业和其他纪念的机会对全体学生宣传“军国民教育”。在校训练，须完成新兵的教育；在营训练，须完成预备役军官佐（士）教育。1935 年的集中训练地点，在苏州“老五团”旧营房，定名为

“上海市第一届学生集中训练总队”。总队长由上海市长吴铁城兼任，副总队长为上海市军训会主任委员焦绩华，公安局长蔡劲军，教育局长潘公展，保安总团长吉章简等。以焦绩华为常务副总队长，负实际责任。各级干部来源，除原有军训教官外，由上海市保安总团调充，这一届参加受训的学生有 2000 多人。1936 年的集中训练地址仍在苏州原地，定名为上海市第二届学生集中训练总队。总队长由驻无锡八十三师师长宋希濂兼任，副总队长为钟彬（八十三师副师长）^①、蔡劲军、吉章简、潘公展和我。我为常务副总队长，负实际责任。各大、中队干部，除以原有军训教官、助教充任外，由八十三师调充。这一届参加受训学生 3000 多人。

训练内容一二两期都大致相同。在军事学科上是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术科上是单兵教练到班、排、连教练，由操场练习到野外演习。在政治教育上，照例是“领袖言行”、“发扬革命精神”、“复兴民族”之类课程。除南京复兴社总社组织的一批“名流学者”以及总队所邀请的上海市军政长官来队作报告和讲演外，主要是由宋希濂和我在每日早起升旗时，经常作“精神讲话”，最重要是依靠派驻各大、中队的指导员利用早晚集合时作简短的讲话，并随时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

训练将届完毕，蒋介石下令召集南京、江苏、上海三地集训学生到南京聆训，并指令京沪铁路专车输送。对学生每人加发新草绿色军服 1 套，水壶、干粮袋、腰皮带各 1 件，并用黄缎印制胸章 1 枚。宋希濂和我为了取得蒋介石的欢心，还集资铸造金头短剑 1 把，在聆训时，当面献给蒋介石。同时到达南京的集训学生连同原在南京的共有 8000 多人。蒋介石在对三省市集训学生训话前进行检阅，在检阅中，频频向学生们点首，在训话中主要

^① 据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宋希濂时任三十六师师长，钟彬时任三十六师副师长。

是讲解“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勉励学生要谨守“四维”、“八德”、“尊师重道”、“忠党爱国”。经这次聆训，我和宋希濂拥护蒋介石更积极。由南京回到苏州后，即发动集训学生向他们的家长募捐，集资 10 万元，购买飞机 1 架，命名为“集训号”，献给蒋介石为祝寿寿礼。

集训完毕后，我回到上海，即积极筹划下一届的学生集训工作，考虑了有 3 个问题必先解决。一是下届应集训的学生将近 1 万人，苏州老营房已容纳不了。二是学生使用的武器、弹药、服装、装备、器材、交通工具、铁床、蚊帐、脸盆、桌凳以及其他一切用具等等，一次设备就消耗几十万元，因无固定营房，保管不易，每年补充一次，又为数不少，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三是由于上海到苏州的交通运输虽有铁路可资利用，在时间上和经济上也是一种浪费，并增加工作上不少的困难。因此，我建议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上海市郊新建营房作为一劳永逸之计。在暑假期间用以集训学生，其他三季，用以集训市民，两得其利。吴铁城接受了我的建议，首先拨款 100 万元，责令上海市公用局长徐佩璜负责计划建造。在上海郊区华漕镇征用民田 350 亩作为建筑基地，采用适应军事需要的既分散又集中的军事堡垒形式，建造一个可容纳 1 万人的完整营房。每个中队配属两幢营房，一为中队部及学生宿舍，一为讲堂及饭厅，并附加有厨房及卫生设备。每个大队为一个区域，当中建造一个大队部。以上均为平房，独总队部为楼房，建立在全营最前面的中央，站在指挥台上面，可以观察到全营的活动。营内设有共同浴室（包括盆堂和池堂），有阅览室、俱乐部，有内操场、外操场。从 1936 年 9 月开工，至 1937 年 5 月建造完成，共花了近 200 万元，并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为“中正营”。1937 年的集中训练即在新建营房举行，定名为上海市第三届学生集中训练总队，总队长由驻在上海附近的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兼任，副总队长仍为蔡劲军、吉章简、潘公展及我。以蔡劲军兼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以我为常务副总队长，负实际

责任。各大、中队干部除以原有军训教官调任外，由八十七师营团长调充。这一届参加受训的学生有 9000 多人，内有女生 100 多人，另成女生队，进行军事看护训练。在集训之前，陈立夫早有准备，计划在这一次对学生要进行大规模的组织活动，经向蒋介石请准在总队部加设政治教官办公室，并指令潘公展以副总队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潘在上海集中大批 CC 系分子，介绍给总队部聘任为政治教官。在潘的指挥下，白天对学生讲授政治课程，晚上分赴各队找学生谈话，暗中进行组织活动。在星期日放假时，还组织学生在外集合或聚餐。复兴社为了阻挠和破坏 CC 系的计划，并进一步争取学生和组织学生，除责成各军训教官利用职权对学生生活行动实行严格的控制外，并在上海调集大批骨干分子，以训育委员会名义分派为各中队驻队指导员，考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动向。总队部又在星期日用专车运送学生回家时，按照他们的住址分地区编组，每车指派军训教官一人负责押运，名为照顾，实际阻止 CC 系分子和学生接触，使他们约会学生的计划无法实现。这次集训，复兴社的收获很大，大量吸收了学生，仅由我经手介绍加入复兴社的就有 500 多人。从此，上海复兴社的声势更壮，气焰更高，和 CC 系分子在上海的争夺战，也占压倒优势。集训完毕后，CC 系分子垂头丧气，大叫失败。这一届训练内容基本上和第一二两届相同，比较突出的是复兴社总社书记刘健群和汪精卫、戴季陶等都来作过讲演。他们讲话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主要是：刘健群讲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的“国策”，汪精卫讲当前形势的剖解及如何救亡图存，戴季陶讲三民主义的真谛。他们都很会讲话，特别是汪精卫的讲话，煽动力很大，讲了四五小时，学生站着听，自始至终队伍不乱。他们讲话后，都表扬学生集训是一个成功的训练。

集训到最后一个半月，即“八一三”的前夕，上海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不断向上海增兵，并在上海到处挑衅制造事端，特别是在 8 月 9 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大有暴雨即到之势。总队